

青年写作

继承传统 拥抱未来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崭露头角；今年以来，《收获》《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作品》等文学期刊以专辑、专号等形式让一批青年写作者集中亮相，引起关注。围绕青年写作相关问题，本报记者约请王尧、张莉、何同彬3位专家学者开启了一场圆桌谈。

记者：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源于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能否请您从文学史角度，谈谈青年与文学的关系？

张莉：谈论青年写作，的确需要文学史意识，从历史线索中去发掘每一代青年的“新变”。比如1915年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时，当时的编者就向社会发布了发刊词《敬告青年》。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新见解。它的作者是新青年，而彼时践行新文学观的写作者，同样也是青年。换言之，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青年写作紧密相关。在我看来，青年写作最大的魅力应该是那种锐气，那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勇气，这是我们对每一代青年作家都寄予厚望的原因。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青年运动。“新青年”这个名字太好了！我们现在讲一个人喜欢文艺，还会说他是文艺青年，意思是他有理想、有情怀，是新青年。但就文化选择而言，每个时期都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前者有老年也有青年，后者有青年也有老年。讨论青年写作，要注意一个问题：如何划分写作中的青年、中年和老年？这比社会学的划分要复杂许多。

何同彬：百年新文学堪称一部波澜起伏、浩瀚博大的“青年文学史”，在转型巨变的重要节点，青年人的文学实践和相关社会活动都以积极向上、勇敢坚毅的姿态，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当然，青年与文学的关联程度、表现方式，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无论是观照社会现实，还是围绕文学的审美、形式所做的各种革命性、先锋性探索，都表现出青年人、青年群体特别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

记者：今年以来，很多文学期刊、评论类刊物和出版社都创新形式，助力一批青年写作者集中亮相，引起文坛关注。青年写作的话题为什么能在当下文学界产生如此热度？

王尧：对青年写作的关注其实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收获》在1987年第5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我们后来称之为“青年作家专辑”，苏童、余华、孙甘露等那时都是青年作家。在之后的几十年，《收获》延续了这个传统。很多杂志也像《收获》一样重视青年作家，也有很多文学批评家关注和引导青年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中就十分看重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每几

◎新作评介

书写人间大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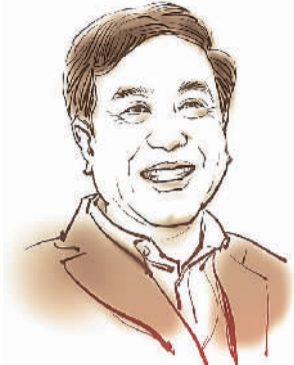
——评肖勤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

冉小江

近年来，作家肖勤的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通过捕捉时间碎片，彰显女性魅力，展现她们在社会生活、生产劳动中坚韧、善良、勇敢的一面。小说《血液科医生》依然秉持作家一贯的创作风格，在调侃、诙谐中不失纯真与善良。

《血液科医生》关注当下，直面现实，聚焦医院的血液科，讲述了黄栀子、夏曦、陈蕴竹等医生、吴芳、胖苏、陈笑笑、申宝贝等护士、小松子、涂金钱、老黄等患者之间爱与守护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活灵活现的人物群像。同时，普及血液病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科普价值。

主角黄栀子立志从医，但有一天自己却意外成了血液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救人于悬崖边的黄栀子一度想放弃生命。在科室同事和患者的鼓励、帮助下，黄栀子重拾生活信心，最终战胜病魔，重返治病救人岗位。医者到患者的巨大落差凸显出人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

年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张莉：去年我编了一本书《耘：每当我们醒来》，收录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同学的作品。编辑过程中，我的强烈感受是，青年写作者的写作状态非常饱满，代表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渴望。这些青年面孔的集体涌入，恰恰说明我们为什么渴望新的写作：我们渴望新的青年力量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新气象。“新青年”不仅意味着生理年龄的年轻，更意味着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的变革。

记者：当下的文学现场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多样化的发表渠道，海量的文学期刊、文学网站、网络自媒体等，成为抒发青年声音的平台。当下有哪些表现抢眼的青年作家，创作出了具有较高辨识度的作品？

何同彬：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主要是对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把握比较有限，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从我个人有限的编辑、阅读经验来看，我比较认可80后、90后群体中一批女性写作者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家，像周嘉宁、孙频、张怡微、郭爽、陈思安、张天翼、朱婧、王占黑、三三、大头马、蒋在、丁颜等。这里罗列的也不全面，只是我个人关注较多的一些女性小说家。相较于男作家，女作家似乎更少受到一些大的潮流、叙事和框架的影响，更忠实于个体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而在需要直面社会问题的时刻，又表现出更多的细腻和敏锐、果敢和坚持。

张莉：我马上想到的是陈春成。他的新意和锐气并不一定反映最新的文学观念，而是说他能从文学史深处寻找写作资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近几年我也看到很多新锐女作家的崛起，比如90后作家三三，她的写作特别有都市气质，特别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流动。又如朱婧，她的作品很多是从家庭主妇的视角或者家庭内部去写。她不仅书写青年成长，更以青年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此外还有富于全球化视野的蒋在，擅长科幻小说的王侃瑜等。总体上看，今天的90后作家已经慢慢走进读者视野，包括丁颜、郑在欢、叶昕鸣、焦典、武芷虹、阿依努尔、王海雪、马亿等一大批年轻人。

记者：2000年后，许多高校延请著名作家到校任教，并开设创意写作课程，设立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学位点。青年作家的成长纳入高校培养机制，有哪些好处？又存在哪些问题？

王尧：新文化形成了新传统，这个传统中，很多大学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诗人，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比如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老舍、陈梦家等，太多了。但这个传统后来断裂了，大家的角色因专业分工越来越单一，单一到文学教授只写研究文章。在我的阅读中，冯友兰、费孝通这些学者的散文都给我震撼，他们都是文章大家。清华大学出版过一本《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里面记载了国文系的课程和任课教师，由此可知当时的文学教育。作家到大学任教是好事，可以提升文学教育质量。至于创意写作，这一舶来品正在中国化。以前说大学不培养作家，但这不是说作家不需要教育背景。我并不反对将青年作家纳入高校的培养机制中，但这个机制需要创新，教什么，谁来教，都需研判。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这些作家朋友不仅教创意写作，还要承担文学通识课，承担中文系的文学课程。好作家不仅有好作品，也有独特的文学观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这对文学教育而言，是宝贵的资源。

张莉：创意写作专业的设置可以发掘、培养写作人才，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观察到，很多原本没有写作经验，或者只是心怀热爱的青年，经过3年系统学习，成为当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个过程中，著名作家担任导师为他们修改稿件，开改稿会，很多同学在读期间就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而没有像当年沈从文、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那样遭遇退稿，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课堂上的引导无法代替创作的艰辛。师从著名导师的年轻人，也要清醒认识到——创作的苦必须自己吃，创作的弯路只能自己走。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场马拉松，是经年累月的孤独的自我搏斗，需要自我心智的磨炼，这不是别人能帮忙和替代的。

记者：从文体角度看，谈到青年写作、青年作家，似乎总是离不开小说，而诗歌、散文、戏剧的声量比较低，这是为什么？

何同彬：小说本来就是相对“强势”的文体，最早从晚清到民国的过渡阶段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个别时代也就只有诗歌可以与之平分秋色，这与小说这一文体承担着更多的叙事功能、表意功能有关，它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之间产生直接关联的可能性、空间更大。当代文学史中，许多文学思潮，其主导文体都是小说，因

小说中的故事读来扣人心弦。患者涂金钱病床前围绕着不少美女，他企图以“招蜂引蝶”的方式，断绝与妻子牛丽香的爱，让她更好地接受自己的离开。在写给医生的信件中，围绕爱情、亲情，涂金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愧对患难与共的妻子，深深的自责让他选择消失。小说亮点纷呈，情节跌宕起伏，设置悬念与解谜环环相扣，随着谜底一点点揭晓，读者的思考也更深入。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和血液科打交道的黄栀子工作认真负责，谁也没有料到她会患上血液病。生病期间，在同事夏曦的刻意安排下，她去巴林看了一棵树。那棵树长在茫茫沙漠里，周边没有一滴水，更没有一株绿色植物，却居然坚强存活了400年。小说借一棵生命之树存活的奇迹告诉我们：“生命不仅仅是宁折不弯的刚强，还是俯身敬畏的柔韧。”

小说中人物形象多元，个性鲜明，助推故事不断发展。血液科元老级医生陈蕴竹业务精湛，几乎不近人情，却是一位竭尽全力为患者服务的好医生；科室负责人夏曦与患者同呼吸共命运，将救护病人当成唯一的职业追求；护士长吴芳看似大大咧咧，实则心思缜密，任劳任怨，将血液科当成了家；护士笑笑在失去未婚夫唐

为小说更好地参与了这些宏大叙事的建构和传播。具体到当下的青年写作，青年小说家们的“成长故事”“个体经验”也更容易引起同时代人的共情，从受众、传播(IP、影视改编等)到市场的“青睐”等角度看，小说这一文体的优势也很明显。

王尧：如果认真考察当代文学，其实并不缺乏好的诗歌、散文和戏剧，但文学批评家关注不够，在文学研究队伍中，研究诗歌、散文、戏剧的学者也相对少些。大众读者的注意力可能也更关注小说，这从“豆瓣”上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谈古代文学，大家对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兴趣并不亚于曹雪芹。所以，关键是要写出好作品。我期待有诗歌、散文、戏剧写作才华的青年朋友，能够写出好作品，也期待文学批评界多关注小说之外的创作。

记者：文学离不开生活，在您看来，当下的青年作家如何与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不断探索时代的精神内核，创作出既属于他们自己、又属于时代的独有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

王尧：我们都在生活之中，但对写作者而言，“在场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自己敏感的区域、细节，也有自己善于发现和描写的“风景”。青年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发现自己的“风景”。我一直在大学工作，是教师，是导师。但我体会到，有时候我们对青年人指导得太多了，一个人归根结底是要在自己的内心搏斗中成长起来。我觉得，不仅对青年作家，对所有写作者来说，他都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现在读作品，在故事中读到生活，但较少读到作为生活中的写作者的“个人”，这个“个人”应该是丰富的、矛盾的、精神性的，他联系着广泛的思想文化背景。从生活到作品，需要思想化、审美化、形式化，这样才能发现生活、创造生活。

张莉：我常常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其实正在经历以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自己的认知或对时代的认识也有独特之处，同时，又有新的困难要面对，比如如何运用新媒体的方式与世界和他人相处等。但无论如何，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属于那一代人必须承受的命运和选择。我也相信他们会写出表现自己时代经验的作品。如果哪一天我们的青年写作者开始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心和文学之眼，他们就会写出不一样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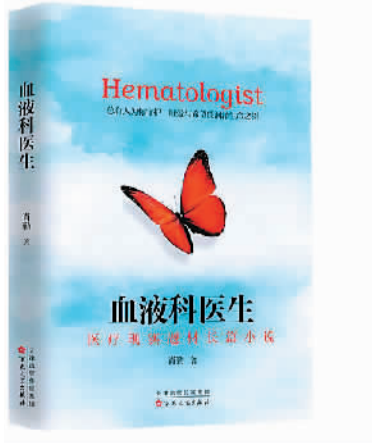
(本文配图由郭红松绘)

明明医生后，化悲痛为力量，毅然选择重新开启生活，奔赴抗疫前线。

小说高潮处，新冠疫情暴发，为了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血液科医护人员组成援鄂医疗队，奋不顾身冲到抗疫一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这群平凡可爱的医者，奉献出人间大爱。

《血液科医生》拓宽了医疗题材领域，正向传递社会价值观念，不失为一部洋溢着温暖与人间真情的大爱之作。

(作者单位：遵义市文联文艺创作中心)



桐城，庐江，合肥。夹竹桃，悬铃木，合欢，丁香。山道，禅寺，村庄，圩田。野史，故事，诗歌，小说。桐城人洪放，闻而志之，行走，观察，体验，思索，遂有了这部散文集《幽深之花》。

乡村，是洪放魂牵梦萦的地方。一踏上这方土地，作者就显得忧郁而多情，连语言也带有南方巷子里幽暗的潮湿。比如：“夹竹桃与合欢，将身体夹紧；南方梅雨季节一到，烟水的气息里，纺车整夜不停。长长的黑白相间的带子，飘在巷子里，仿佛一根根枯瘦的手指，想抓住风、月、光、露水、鸟鸣与她养在烟火里的卑微内心……”

这些语言，有文采，有思想，有趣味。

洪放的乡村，是江南的乡村，一切都指向人物的命运。木槿和异乡的读书人，夜行火车和壮年际落的弟弟，淮河流水上那艘船上的男人和女人，某一个夜晚在南方的桐花下猛然闻见的祖母的气息……微妙的感情无处不在。“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将一盆水泼洒在用破缸养着的那盆草花上”，作者仅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她的命运。语言精准地附着于他要叙述的内容，虽简，却含蓄、内敛，这是中国散文之正宗小品，含金量足。

令我称羨的，还有《幽深之花》中节奏的控制，相当自律，却又意象十足，就像一个富翁，衣着虽然朴素，却有一种无法掩盖的气质。如《竹子开花》，全文仅200字，洪放像是设置了一个谜题——“有一种植物开花，却是越走越短的路，越晒越低的日头。”谜底，正明晃晃地公布在标题中。还有《楚



为变革时代的乡村“作证”

——读江子《回乡记》

徐晓军

《回乡记》是一部散文集，加上“代后记”，共计14篇，写的是江西吉水赣江以西那片土地上的的人和事。枫江镇的下院洲村，是整部书聚焦的核心地域。作者江子，正是下院洲村人。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后来调到县文联，再后来又调到省文联。

我曾在枫江镇工作11年。期间，有幸与江子谋面，并陪他在村子里转悠。当时我很惊奇，在省会工作的江子，和村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熟悉。屠户、剃头匠、赤脚医生、晒太阳的老人……碰上的每一个，他都能聊上十几二十分钟。不是久别重逢挖掘共同回忆的那种聊天，而是如数家珍式的，聊最近的生活与变化，聊不远的计划与打算，询问那些在远方或在身边的亲朋好友。每每聊到一个新话题，对话题的背景，江子经常比当事人还清楚。

我慢慢体会到，江子频繁返乡的意义——他创作的根，在这里。

江子步入文坛，从写诗开始。上世纪90年代，在乡村小学教书的江子，多次获诗歌奖。20多岁的他，将自己的诗歌写作定位为“逼近现实”。他坚守自己的定位，为了与现实贴得更近，转向散文创作，书写乡村之变。一部《回乡记》，囊括了剧变下乡土内外几乎所有与乡村人有关的那些悲欢离合，那些梦想与悔悟、疼痛与温暖。他是一个见证者。

很多人在努力为变革时代的乡

凝练语言的功力 读洪放《幽深之花》 陆春祥

一文，层层自然引申，虽字字惜金，却张力巨大。

或许，诗人有着庸常事物命名的本事和冲动。一经他们的眼睛望出去，一经他们的笔端流出来，世界便是另一番面貌。在这片土地上而复始生活着的人类，是多么渴望这种新奇的角度。我以为，洪放这种节奏的自律，并不是词穷，而是一种凝练语言的本事，它缘于诗人的功底。

而《存史或者废弃——关于古镇三河的桥》一文，洪放竟然用了长达30页的篇幅，写了三河古镇的桥。沈家桥、马氏桥、油坊桥、木鹤桥、无蚊桥、二龙桥，从古写至今。其中的史料翔实，节奏跌宕，称得上是浩瀚。在这里，桥，已经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表征。30页的篇幅，生动的故事之间相互勾连，丝毫不显得冗长。

赏完《幽深之花》，繁花无限，各呈风姿，我有一种想要阅读洪放小说的冲动。我想看他如何在诗歌的意象之美、散文的语言之美和小说的叙事之美中自由地切换。

《秘书长》《百花井》《先生的课堂》以及《幽深之花》——如灿烂的鲜花，次第盛开。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得主)

村“作证”——梁鸿的“梁庄”系列、陈庆港的《十四家》、浙江大学学生们的《生存故事：50位农民工访谈实录》……江子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早期诗歌创作训练出来的思维及驾驭语言的方式，让他的散文情绪充沛，诗意盎然。像一条历经沧桑同时又身披锦绣的鱼，一座苦难又光明的殿堂。它是古老的，我知道它有着最少800年的历史，可它又是簇新的，一年一度的春节会将它施洗如婴。这样的句子，其实是诗。

江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显性事件记录的恰当时机，完整演绎人物的心理世界，让那些寡言的农民，顿时丰满起来，鲜活起来。这种演绎，和一般的心理描写大为不同，是想象与洞察相结合的产物。人物的行动逻辑，由此得到充实。这也让他的文章，更具趣味，更可读。



专家学者共话传记学学科建设

本报电(曹语千)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学科分类中传记学的学科归属”“传记的跨学科性质及未来发展方向”“传记教育及教学”“传记学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是传记大国，传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等层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传记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命题，具有时代意义和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在当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在新文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的前提下，传记学学科建设将迎来新机遇。